

經典間諜小說的出版與閱讀

蔡明燁 《臺灣研究國際學刊》總編輯暨文字工作者

一、緒論：武俠小說 VS. 間諜小說

我是武俠小說迷，先生格雷是間諜小說迷。我閱讀的武俠小說停留在古龍與金庸年代，但格雷閱讀的間諜小說倒是與時俱進，因此受教於格雷，本文旨在爬梳經典間諜小說，從中整理出一個閱讀指南。

表面上看來，武俠小說和間諜小說天差地遠，是截然不同的文化產物，但在我眼中，兩者亦有雷同之處，所描寫的都是一種風波詭譎的「江湖」。武俠世界和諜報世界裡的江湖生死難料，道德、情義、是非、敵友界線模糊不清，也所以故事裡的主人翁要求生存，要脫穎而出，除了必須擁有過人的智慧、膽識和能力之外，還必須有某種堅定不移的信念，此信念——不同於冒險故事裡的浪漫英雄——不見得是一種崇高到遙不可及的「理想」，往往更是一種能夠讓書中人物與讀者都信服、接受的做人的底線。

於是從這個角度看，武俠小說和間諜小說都有一點弔詭，它們書寫的江湖固然不能用世俗的道德來規範，但優秀的武俠小說和間諜小說家心中，卻多半會有一把尺，當我們把錯綜複雜的故事情節、千絲萬縷的人物關係抽絲剝繭到最後，便會發現這兩個文類的代表作，其實都是很講人

性的書。

接下來本文將討論西方間諜小說的歷史脈絡、黃金時期發展出的三大創作路徑，以及後冷戰時代迄今的類型分支，並藉此推介箇中的經典作家與作品。

二、間諜小說的歷史脈絡

間諜小說的歷史悠久，以《最後一個摩希根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另譯《最後一個莫希干人》或《大地英豪》) 聲名大噪的美國作家庫柏 (James Fenimore Cooper)，早在1812年就出版了《間諜》(The Spy) 一書(註1)。

繼庫柏之後，雖然19世紀還有其他零星的嘗試，但詹宏志認為具有現代意義的間諜小說始於1903年，是愛爾蘭獨立運動政治推手柴德斯(Erskine Childers)所寫的《沙岸之謎》(The Riddle of the Sands)。本書講述兩個出自仕紳階級的年輕人，無意間發現德國在秘密水域籌建海軍，有挑動戰爭的跡象，因此他們感到非常糾結，不知道是否應該紆尊降貴去打探消息，從事諜報活動這麼骯髒、不可告人的低賤工作。猶豫再三後，他們相信在國家衝突當中，利用間諜蒐集情報是必要手段，於是本書終於帶給

了諜報小說一個道德性的答案，提供間諜這個職業的論述基礎（註2）。

另一部公認的早期經典，是安布勒（Eric Ambler）1939年出版的《狄米崔歐斯之棺》（A Coffin for Dimitrios），講述一個推理小說家被捲入一樁國際謀殺案件的調查，透過「業餘者誤入情報世界」的故事主軸，將黑市、企業與政府的灰色勾連寫得栩栩如生，而書中人物跨國度的足跡和縝密佈局，以及遊走善惡邊緣的道德曖昧，為現代間諜小說提供了重要範本，連在諜報小說界極富盛名的大師勒卡雷（John le Carr）也很推崇安布勒，說他是「我們所有人汲取靈感的泉源」（參見註1）。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二戰留下的祕密戰線，以及冷戰時期的對峙與滲透，間諜小說在1950-80年代走進了黃金期，成為一種通俗消遣及影視改編，一方面製造民族想像，二方面拆穿權力幻象，三方面又藉著貼近歷史縫隙，突顯國際與社會秩序背後的人性陰影。此時期的諜報小說發展出三條清晰的寫作路徑，由英國作家獨領風騷：佛萊明（Ian Fleming）的浪漫化民族英雄，葛林（Graham Greene）的道德困境，與勒卡雷（John le Carr）的冷峻解魅。三者彼此牽引，也在冷戰後的全球文學及影視圈繁衍出眾多分支，從英式頹唐到美式高動能，從辦公室黑色幽默到女性與全球南方的視角，再到強調技術細節的「行家派」。

冷戰的終結並未讓間諜小說消退，理由很簡單：諜報小說的宗旨並非在對抗某個單一的敵

國，而是反映人性內在深層的焦慮，尋思個體如何在巨大組織、密室政治與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維持自我。因此，從反恐到中美新競逐，再到網路監控與大數據，間諜小說的題材只會不斷再生、更新與擴張。

三、黃金時期的三種典範：英雄、困境、解魅

1) 佛萊明：浪漫化的民族英雄

佛萊明原本是記者，戰爭爆發後於1939年被徵召進入英國海軍情報局（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ID），退伍後，此經驗直接啟發他的小說創作，使他筆下的特務世界帶有一定程度的真實基礎。

1953年，佛萊明以《皇家賭場》（Casino Royale）推出他小說中的首位主角——代號007的情報員詹姆斯·龐德。故事裡，龐德奉命擊垮蘇聯情報組織的同路人勒希弗，小說融合了諜戰、賭局與美酒佳餚，既緊張刺激，又展現了佛萊明獨有的優雅筆觸。此書一經出版便獲成功，揭開007系列序幕，也開創了諜報小說的新局面。

佛萊明的007小說之所以別具特色，在於他對細節的偏執描繪。他不僅讓龐德歷險驚心動魄，更花心思刻劃生活場景，包括早餐吃什麼、咖啡如何沖泡、穿著的西裝出自哪位裁縫，甚至連洗澡的水溫變化等，都描寫得精準而生動。這些生活細節讓角色有血有肉，也讓讀者在緊張氛圍之外，體驗到一種充滿品味的世界。因此若說

007 是戰後英國的心理補償與文化輸出，並不為過，小說裡的龐德是「公務員間諜」：懂酒、懂車、懂禮儀，任務之餘仍要享受生活。文本強調細節與節制的快感，《皇家賭場》尤其可見——在牌桌與審美之間，國家暴力被包裹成精湛的個人技藝。

佛萊明筆下的龐德形象，有異於後來電影裡的浪漫英雄。搬上大銀幕後，龐德被塑造成冒險、浪漫與性感的化身，為衰退帝國製造持久的自信敘事；但在小說裡，他冷峻、務實，甚至殘酷，同時具有脆弱與孤獨的一面。這種複雜性，使小說版龐德比銀幕上的 007 更具張力與立體感。

隨著系列發展，《俄羅斯情書》(From Russia With Love, 1957)、《霹靂彈》(Thunderball, 1961) 等作品不僅延續了間諜與冒險的主軸，更納入冷戰時期的科技與國際局勢，從核武危機到太空競賽，都成為小說情節的背景。值得一提的是，《霹靂彈》是先有電影構想，再回寫成小說，顯示 007 系列早已進入娛樂工業化的時代，成為此類創作生生不息的重要取徑，也為美式高動能的諜報敘事提供了一種性感標竿。

007 小說既寫實又帶著幻想色彩，反映了戰後英國在情報與國際地位上的焦慮，並讓讀者沉浸在華麗的諜報夢境中。正是這種結合現實與想像的力量，使龐德從文學走向銀幕，最終成為跨越世代的文化符號。

2) 葛林：凡人的道德困境

與其說葛林是一位間諜小說家，不如說他是一位技巧高超、風格精湛的文學家。他的創作超越類型框架，將間諜小說推向更深的道德與人性層次。葛林一生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卻始終未能獲獎。其原因不僅在於題材多觸及政治、宗教與倫理矛盾，也與瑞典學院內部對其作品評價的分歧有關。然而，無論是否得獎，他在 20 世紀文學史上的地位都已確立。

在葛林筆下，間諜從來不是銀幕上風流瀟灑、手持馬丁尼的浪漫英雄，而是被現實壓迫的小人物。他最擅長把壯闊的敘事拉近到個體身上，讓國家與政治的陰謀轉化為血肉之軀的痛苦掙扎。忠誠、信仰與背叛在他的小說裡並非抽象的口號，而是會讓角色徹夜難眠的靈魂拷問。若說佛萊明的 007 系列讓家國看似友愛可信，那麼葛林的小說則揭示了國家機器的冷酷無情。

《職業殺手》(A Gun for Hire, 1936) 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書中的殺手並無高遠的政治願景，他出身貧苦，先天缺陷讓他連基本的體面都難以維繫。為了生存，他接受僱傭去殺一位政治人物，卻在交易過程中被雙面利用。一張原本想用來取悅戀慕對象的鈔票，最終將他推向警察的追捕。葛林透過這個故事揭露個體如何在權力與金錢的操弄下失去自主，淪為命運的犧牲品。

更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安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 1955) 與《哈瓦那情報員》(Our Man in Havana, 1958)。前者以越南

為背景，描寫聰明、天真的美國中情局（CIA）探員派爾，懷抱理想主義，深信美國能以「第三勢力」協助越南獨立，然而他對真實的越南社會卻一無所知。派爾的理想主義最終導致暴力與死亡，迫使年長的英國記者佛勒在愛情與責任之間掙扎：是繼續冷眼旁觀，還是挺身介入，阻止更多悲劇發生？這部小說既是冷戰的寓言，也是一場道德審判。

《哈瓦那情報員》則將諷刺推向極致。小說中的主角沃姆沃德，是在古巴販賣吸塵器的推銷員，因為家庭與經濟壓力，被英國情報局吸收為線民。然而，他既無資源也無能力獲取情報，只能憑空捏造，甚至把吸塵器零件的設計圖當作「秘密武器」上繳。荒誕的是，倫敦高層信以為真，派人來哈瓦那調查，引發大國角力。隨著情勢惡化，沃姆沃德的親人接連失蹤，他的謊言逐漸走向失控。這個故事可笑卻又令人不寒而慄，提醒讀者：當情報工作落到凡人身上，日常的瑣碎與私慾，足以扭曲整個國家機器的判斷和運作。

葛林之所以能把間諜小說寫得如此真切，與他的親身經歷密不可分。二戰期間，他曾在英國軍情六處（MI6）效力，這段經歷讓他深知情報體系理性的一面，也洞察其謬誤與危險。他的作品冷靜且富含倫理反思，擅長將宏大歷史壓縮為個人悲喜，讓讀者明白：國家向你索取的，往往不是抽象的忠誠，而是你最珍惜的東西。因此，葛林的間諜小說並不僅是驚悚懸疑的娛樂讀物，更是深刻的人性寓言。他筆下的人物無力改變時

代，但他們的掙扎與抉擇卻讓讀者看見，歷史的重量如何壓在個體肩頭。這是葛林文學力量之所在，也是他縱然屢失諾貝爾獎，仍能在世界文學佔有一席之地的原因。

3) 勒卡雷：冷峻的解魅與體制批判

勒卡雷無疑是現代間諜小說的翹楚，曾任職於英國軍情五處（MI5）與六處，熟悉情報制度的細節，卻更致力於揭露體制的犬儒與不近人情。他的作品不僅扣人心弦，更是對忠誠、背叛與人性孤寂的深刻書寫。他告訴我們：國族榮耀慣常以個人崩潰為代價，而成功帶來的多半不是掌聲，而是更深的孤獨。

勒卡雷於1963年出版的《冷戰諜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奠定了他在文壇的地位。小說描寫情報員李馬斯受命假扮叛逃者，以引誘東德情報機構。作品充滿冷戰時代的灰色氛圍，揭示西方與共產陣營同樣操弄骯髒遊戲的現實。核心人物是一名終身活在謊言中的情報員，連對至愛之人也不得不欺騙，呈現出情報工作的殘酷與荒涼。這部小說一經出版便風靡全球，隨後改編為電影，由巨星李察·波頓主演，更讓勒卡雷聲名大噪。

1974年問世的《鍋匠，裁縫，士兵，間諜》（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進一步展現了勒卡雷的格局。小說中的史邁利與電影裡的龐德截然不同：矮小、禿頭、身材發福，舉止謙遜甚至有些笨拙。他不是瀟灑的英雄，而是低調、隱忍、冷靜到近乎透明的反英雄。史邁利重

返情報局，肩負揭露高層內奸的重任，體現出勒卡雷筆下情報世界的殘酷真相。

在自傳《此生如鴿》（*The Pigeon Tunnel: Stories from My Life*, 2016）中，勒卡雷回憶自己成名的過程，也揭露了與文壇、政界、外交圈乃至好萊塢的種種交往。他筆下的世界既真實又怪誕，時而帶有鬧劇化的喜感。書中也觸及他與父親的糾葛——父親是一名詐騙成性的浪子，終生追逐發財夢，卻給家庭帶來無盡痛苦。勒卡雷坦言，他部分選擇遠赴歐陸讀書與進入外交體系，正是為了逃離父親的陰影。這段成長經驗深深烙印在他的創作裡，讓他特別敏感於權力、謊言與人性弱點。

勒卡雷早期的作品《上流謀殺》（*A Murder of Quality*, 1962）尚未完全確立間諜小說的路數，但自《冷戰諜魂》後，他幾乎再未脫離情報圈題材。情報圈在他筆下被稱為「馬戲團」（*circus*），是一個既荒唐又致命的世界。自葛林盛讚《冷戰諜魂》為「我所讀過最好的間諜小說」後，勒卡雷真正成為推動間諜小說走向文學高度的代表人物。

詹宏志表示，勒卡雷的小說還帶有預言性。《鏡子戰爭》（*The Looking Glass War*）描寫情報單位買通民航機進行偵照，出版於1965年，卻與1983年韓航班機事件驚人相似。小說揭示出被忽視的老情報員，如何因一場任務而重新燃起使命感，最終卻遭到被遺忘的悲涼結局。這種「國族幻滅」的書寫，直指愛國與忠誠背後的假象（參見註2）。

勒卡雷的小說比前輩葛林更深入情報核心，觸及權力運作的真相，因此他始終面對職業風險。情報圈有人視他為「叛徒」，指責他將內部秘密販售為文學。然而，他堅稱自己的作品並未依賴真實案例，而是源自想像與倫理省思。他既是葛林的繼承者，也是佛萊明的對照者，前者的冷靜與道德困境，後者的浪漫與英雄想像，皆在他筆下被重新界定，而勒卡雷書中的人物與故事，至今也仍在不斷提醒世人：國家與榮耀背後，經常潛藏著孤獨、欺瞞，以及對人性的無盡扣問。

四、後冷戰及冷戰後的類型分支

在上述三大典範之餘，隨著時代變遷，間諜小說也衍生出許多分支，以下僅就私人淺見分享五個次類型。

1) 英式現實主義：灰色的人、灰色的機構

由安布勒、葛林到勒卡雷的冷調軸線，衍生出戴頓（*Len Deighton*）的英式現實主義，其中，*The Ipcress File*（1962年）開啟了*Harry Palmer*電影系列，奠定了戴頓的地位，而《柏林遊戲》（*Berlin Game*, 1983）則開啟了*Bernard Samson*的系列長篇，被認為是戴頓晚期的代表作。他的作品主打以工人階級反英雄挑戰菁英敘事，風格介於佛萊明的娛樂與勒卡雷的寫實之間，不似勒卡雷那麼沉重，也不像佛萊明那麼浪漫，但更偏向低調諷刺，帶有冷峻的幽默感，故事多將冷戰日常化，強調情報工作的官僚

性、荒謬性與人性的脆弱。

2) 美式高動能：速度、火力與科技想像

由佛萊明的優雅光譜延伸出的動作化敘事，可以克蘭西 (Tom Clancy) 的《獵殺紅色十月號》(The Hunt for Red October, 1984) 為代表。本書首次引入 Jack Ryan 這個角色，一出版就受到高度矚目，後來在 1990 年被改編成史恩·康納萊和艾力克·鮑德溫主演的同名電影，並有多達十本的 Jack Ryan 主線系列 (1984 - 2003 年)，以及後來由多位作者續寫的 Jack Ryan Jr. 系列 (2010 - 2023 年)。這條路線讓科技驅動的軍事細節進入主流，其核心快感，在於將地緣政治具象化為節奏明快的追逐——武器、戰術、情報分析與近身格鬥的「工法之美」，與讀者的體感緊密相連。

3) 非典型與黑色幽默：邊緣人的辦公室戰爭

1963 年出生於英國北方的赫倫 (Mick Herron)，在牛津大學時主修英國文學，目前主要以倫敦為寫作與生活重心，近年來以《廢柴特務》(Slow Horses, 2010) 異軍突起。這是他「斯勞樓 (Slough House)」系列的第一本小說，講述一群因各種錯誤或失敗而被流放到情報機構邊緣部門的特工故事，讓他們在文書瑣事、監視與庸常人生裡偶爾成為「關鍵齒輪」，既延續灰色現實的基調，又加入辦公室喜劇的狠辣與自我解嘲，具有強烈的諷刺與幽默風格，成為繼勒卡雷之後，最受讚譽的英國間諜小說家。我們

可以說佛萊明的 007 系列提供了華麗浪漫的冒險，葛林寫出了文學性極強的政治寓言，勒卡雷的史邁利系列勾勒情報世界灰暗的現實與道德曖昧，戴頓藉庶民特工的視角冷眼旁觀諜報工作的日常，赫倫的黑色幽默則最具現代感，對情報機構的荒誕與人性弱點冷嘲熱諷。

4) 女性與全球視角：走出盎格魯世界

最近十年，女性作者與非英美視角總算也開始成為間諜小說的活力泉源了！例如女作家威金森 (Lauren Wilkinson) 的《美國間諜》(American Spy, 2019)，融合了諜海驚悚與家庭／身分認同議題，主角是一位在冷戰後期參與非洲行動的非裔美國女性情報員，藉此重溯冷戰後的美國外交陰影；另一位女作家貝瑞 (I. S. Berry) 曾在 CIA 擔任情報官，轉向小說創作後的處女作為《孔雀與麻雀》(The Peacock and the Sparrow, 2023)，以巴林為背景，融合了諜報懸疑與政治、文化衝突，把阿拉伯之春的情感與權力糾葛寫成綿密而灼熱的心理劇，被視為對冷戰後「美國間諜文學」的一次新詮釋。

男作家方面，1971 年出生於越南的阮清越 (Viet Thanh Nguyen)，1975 年隨家人移居美國，後來成為南加州大學的教授，小說《同情者》(The Sympathizer, 2015) 以越南雙面特務的自白，拆解冷戰記憶與好萊塢表述，在 2016 年獲得普立茲小說獎，文學性十足；至於曾任《衛報》(The Guardian) 記者的英國作家布魯克斯 (Adam Brookes)，駐點過中國多年，對東

亞局勢有深刻觀察，《夜鷺》（Night Heron，2014）是他所寫 Philip Mangan 系列的第一部小說，以中國為主要背景，講述一名因間諜罪被囚禁的中國科學家越獄後，與英國記者捲入情報陰謀的故事，第二部《間諜遊戲》（Spy Games，2015）延續記者 Philip Mangan 的故事，轉往非洲，描繪新冷戰格局，第三部《間諜的女兒》（The Spy's Daughter，2017）聚焦下一代，足跡擴展至俄羅斯與歐洲，將系列主題推向全球舞台。布魯克斯的小說可看成「後冷戰時代的新聞式間諜小說」，一方面延續勒卡雷的某些寫實傳統，但加入了自己身為戰地記者的現場感。此類作品共同讓間諜小說跳脫出東西對峙的二元觀點，呈現 21 世紀多中心世界的複雜與混沌。

5) 技術寫實與專業細節：行家派的樂趣

長期擔任《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外交與情報領域記者的伊格內修斯（David Ignatius），小說《無辜的特工》（Agents of Innocence，1987）以 CIA 在黎巴嫩與巴勒斯坦的活動為背景；曾任 CIA 官員的馬修斯（Jason Matthews），小說《紅雀》（Red Sparrow，2013）設於 21 世紀，但仍延續冷戰式的美俄對抗。這類作品或可分別歸類到其他分支，但其最大特色在於作者以個人情報或新聞專業為底，細寫反監視路線、線民經營、通訊與訓練流程，把間諜細節——尤其是情報工作的步驟、特工培訓、冷戰與後冷戰的情資手法等——寫得格外詳盡，故稱之為「行家派」。此路線提

醒我們：「真實感」不只是地名器材的堆疊，而是組織文化與行動風險的準確感——讀者在文本中習得的，是如何在敵意空間做出「看似普通、實則安全」的選擇。

五、當代影視互動：從書頁到螢幕再回來

新世紀的間諜敘事在大眾文化持續升溫，影視為文本拓展讀者群，小說則提供影視可反覆開採的題材礦脈——彼此借力，使文類更加風起雲湧。

今天的間諜故事，愈來愈難只靠「攔截公文」來推動情節，資料洪流、監控資本主義、供應鏈與企業安全、演算法偏見與數據汙染、外包與民間承包商、跨國平台與國安的灰色合作……等，都是勒卡雷式解魅的新素材，把諜報書寫推向新場域，與此同時，讀者也已非常熟悉套路，因此作者若要再創驚奇，可能更須在「間諜故事的生產與消費」本身動手術。

回望一個多世紀的變化，間諜小說一直在浪漫與寫實之間擺盪：佛萊明提供民族自信與娛樂；葛林放大凡人的道德縫隙；勒卡雷則把榮光剝皮，直視制度冷酷。冷戰結束後，國際秩序換了布景，舞台上卻仍是同一群被召喚、被消耗、在忠誠與愛之間難以取捨的孤獨個體。勒卡雷說過：間諜小說不是因冷戰而生，也不會因冷戰結束而亡。因為它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祕密本身，而是人在祕密之中如何抉擇——在謊言與真相之間，如何仍保留一點能被稱作「人」，或稱

作「自己」的東西。

註釋

1. Tom Tivnan, “From Bond to Argyll: how spy fiction has evolved”, Penguin Books, 20 February 2024: <https://www.penguin.co.uk/discover/articles/best-spy-thriller-books-new-classics>
2. 詹宏志主講、安靜整理記錄，「2017 Openbook 好書獎導讀講座：田園與現實、007 與史邁利，間諜小說的兩個世界」，Open Book, 12 January 2018: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1008>

延伸閱讀（依書籍在本文出現順序）：

- 厄斯金·柴德斯著，《沙岸之謎》，台北：皇冠，1998
- Eric Ambler, *A Coffin for Dimitrios*, New York: Vintage, 2001 [1939]
- Ian Fleming, *Casino Royal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2023 [1953]
- 伊安·佛萊明著，《俄羅斯情書》，台北：皇冠，1998
- Ian Fleming, *Thunderball*,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2025 [1961]
- 格蘭姆·葛林著，《職業殺手》，台北：皇冠，1998
- Graham Greene, *The Quiet American*, New York: Penguin, 2004 [1955]
- Graham Greene, *Our Man in Havana*, New York: Oberon Books, 2010 [1958]
- 約翰·勒卡雷著，宋瑛堂譯，《冷戰諜魂》，台北：木馬文化，2020
- 約翰·勒卡雷著，董樂山譯，《鍋匠，裁縫，士兵，間諜》，台北：木馬文化，2021
- 約翰·勒卡雷著，李靜宜譯，《此生如鴿》，台北：木馬文化，2021
- 約翰·勒卡雷著，宋瑛堂譯，《上流謀殺》，台北：木馬文化，2014
- 約翰·勒卡雷著，宋瑛堂譯，《鏡子戰爭》，台北：木馬文化，2005

- Len Deighton, *The Ipcress File*, New York: Grove Press, 2023 [1962]
- Len Deighton, *Berlin Game*, New York: Grove Press, 2023 [1983]
- 湯姆·克蘭西著，陳潮州譯，《獵殺紅色十月號》，台北：星光，1991
- Mick Herron, *Slow Horses*, New York: SOHO Crime, 2020 [2010]
- Lauren Wilkinson, *American Sp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20 [2019]
- I.S. Berry, *The Peacock and the Sparrow*, New York: Atria Books, 2024 [2023]
- Viet Thanh Nguyen, *The Sympathizer*, New York: Grove Press, 2016 [2015]
- Adam Brookes, *Night Heron*, New York: Redhook, 2016 [2014]
- Adam Brookes, *Spy Games*, New York: Redhook, 2016 [2015]
- Adam Brookes & Colin Mace, *The Spy's Daughter*, New York: Redhook, 2017
- David Ignatius, *Agents of Innocenc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7 [1987]
- Jason Matthews, *Red Sparrow*,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14 [2013]